

湖北省考古学会 论文选集

(一)



2083

48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论丛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

(一)

湖北省考古学会选编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

一九八七年七月

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

编辑、出版 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

(湖北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期刊登记证第133号)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定价：2.35元

序 言

湖北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唐 长 孺

(武汉大学历史系)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湖北的考古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随着全省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九七九年七月在武昌正式成立了湖北省考古学会。

八年来，本着团结全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努力提高我省考古研究水平，推动全省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宗旨，湖北省考古学会在武昌(两次)、宜昌、孝感、大冶、江陵召开了六次年会，分别围绕楚文化的有关学术专题及江汉地区的商周文化、鄂东南地区的古代文化和长江中游诸原始文化等主题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分布于全省各大专院校及各级科研、事业单位的一百七十一名会员为历次年会撰写了一百九十七篇论文。这些论文除一般资料报导外，多根据我省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结合历史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水文学、矿冶学、古生物学及古代科技史的有关资料，对楚文化和我省各时期的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其中在我会与省博物馆合办的《江汉考古》上发表了23篇、在省内其它书刊上发表了17篇、在全国性书刊上发表了30篇。这些论文对促进我省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考古学研究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进一步推动我省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我会决定从第六次年会起，陆续编辑《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这次与读者见面的第一辑以第六次年会的部分论文为主，并酌选了前五次年会中尚未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共收论文32篇。由于篇幅所限，一些文稿未能收入。

综观已选入的论文有如下特点：

1. 内容广泛。除介绍湖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外，还有专门论述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商周文化及楚文化的各组论文。涉及的学科除考古学外还涉及各种相关的边缘学科。

2. 鲜明的地方特点。本辑论文以论述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历史问题为主，对于了解湖北考古学的发展与地方历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作者分布面广。有在省以上科研单位多年从事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的老同志，又有在基层从事考古工作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有专业考古工作者，也有一些业余文物爱好者。

这些论文对于提高我省考古学研究水平和促进学术活动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些论文中的新资料、新观点、新的研究方法，对于广大读者也将有所裨益和启发。

这本论文选集的出版曾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我会编辑小组的同志们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使以后所编《论文选集》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活泼、成果更可观，我热切地希望我会的同志，积极撰写论文，多多参加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也希望有关方面继续给予关心与支持，为开创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新局面，加速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目 录

序 言	唐长孺 (1)
零的突破与黄金时代	
——湖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谭维四 (3)
丁家岗遗存的相对年代与大溪文化的分期	李龙章 (13)
谈中堡岛大溪文化遗址石器的特点及工艺	卢德佩 (21)
江汉地区以黑陶为主的原始文化遗存	张绪球 (26)
石家河文化典型陶器及相关问题刍议	彭明麒 (35)
对孝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点认识	周厚强 (42)
浅谈鄂东北地区古代文化	熊卜发 宋煥文 (52)
试论盘龙城商文化	方酉生 (63)
试论商代盘龙城早期城市的形态与特征	王 劲 陈贤一 (70)
荆南寺商代陶器试析	王 宏 (78)
湖北省楚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	杨权喜 (83)
湖北楚墓综述	陈振裕 (95)
鄂东楚墓综述	王善才 (107)
楚文化范畴泛议	程欣人 (113)
楚民族溯源	丁永芳 (117)
“郢爱”新考	黄德馨 (122)
曾侯乙墓青铜礼器初步研究	刘彬徽 (133)
古文字资料中所见楚国同诸侯国的关系	舒之梅 罗运环 (143)
鄂王城略考	
——兼谈鄂君故城	龚长根 (151)
楚器《中子化盘》作器年代管窥	李 瑾 曾昭岷 (154)
试论巴、楚文化交流	邓 辉 (167)
湖北地区古象的迁徙与气候的变迁	何 浩 (171)
三苗与濮关系初探	林邦存 (176)
上古墓葬头向与民族关系	张胜琳 张正明 (186)
谈铜绿山古代矿冶技术的成就	周保权 胡永炎 卢本珊 杨永光 (199)
鼃、螭、盘螭文及其它	刘先枚 (205)
释𧇵	滕壬生 (208)
释酏(灌、裸)	夏 涿 傅天佑 (210)
《算数书》与《九章算术》	陈跃钧 陈燕萍 (220)
神豹捕獐图试释	院文清 (223)
赤壁古战场续考	冯金平 (228)
《吴王夫差矛》跋	黄建中 (232)
编后记	(235)

序 言

湖北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

唐 长 孺

(武汉大学历史系)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摇篮。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建国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湖北的考古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随着全省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一九七九年七月在武昌正式成立了湖北省考古学会。

八年来，本着团结全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努力提高我省考古研究水平，推动全省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宗旨，湖北省考古学会在武昌(两次)、宜昌、孝感、大冶、江陵召开了六次年会，分别围绕楚文化的有关学术专题及江汉地区的商周文化、鄂东南地区的古代文化和长江中游诸原始文化等主题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探讨。分布于全省各大专院校及各级科研、事业单位的一百七十一名会员为历次年会撰写了一百九十七篇论文。这些论文除一般资料报导外，多根据我省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结合历史学、古文字学、民族学、地理学、水文学、矿冶学、古生物学及古代科技史的有关资料，对楚文化和我省各时期的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其中在我会与省博物馆合办的《江汉考古》上发表了23篇、在省内其它书刊上发表了17篇、在全国性书刊上发表了30篇。这些论文对促进我省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考古学研究的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进一步推动我省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我会决定从第六次年会起，陆续编辑《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这次与读者见面的第一辑以第六次年会的部分论文为主，并酌选了前五次年会中尚未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共收论文32篇。由于篇幅所限，一些文稿未能收入。

综观已选入的论文有如下特点：

1. 内容广泛。除介绍湖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的综述性文章外，还有专门论述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商周文化及楚文化的各组论文。涉及的学科除考古学外还涉及各种相关的边缘学科。

2. 鲜明的地方特点。本辑论文以论述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历史问题为主，对于了解湖北考古学的发展与地方历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 作者分布面广。有在省以上科研单位多年从事考古工作与历史研究的老同志，又有在基层从事考古工作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有专业考古工作者，也有一些业余文物爱好者。

这些论文对于提高我省考古学研究水平和促进学术活动的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些论文中的新资料、新观点、新的研究方法，对于广大读者也将有所裨益和启发。

这本论文选集的出版曾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我会编辑小组的同志们也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使以后所编《论文选集》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活泼、成果更可观，我热切地希望我会的同志，积极撰写论文，多多参加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也希望有关方面继续给予关心与支持，为开创我省文物考古事业的新局面，加速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零的突破与黄金时代

——湖北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谭 维 四

(湖北省博物馆)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素有“文物大国”之称，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运用这些遗存来研究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兴起，则是比较晚的事情，先是一些外国考察家到我国各地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才有我国自己的学者主持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但人数很少，地域也只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长江下游的个别地点，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地区则是空白点。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考古学在湖北处于“零”的状态。

零 的 突 破

新中国的成立，为湖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纪元。经过五十年代的努力，实现了零的突破。

一、专业机构的建立与人才的培训。五十年代初，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一批专业机构的建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纷纷派专业考察队来湖北工作；从1952年到1955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四期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我省培养了第一批掌握田野考古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十余人)。使考古专业机构和专业队伍在湖北实现了零的突破。

二、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1951年荆江分洪工程首开纪录，在江陵草市镇唐家山清理了一座西汉木椁残墓^①；1954年冬配合石龙过江水库渠道工程，在京山、天门境内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②，次年2月，在考古所王伯洪，张云鹏等的指导下，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京山屈家岭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③，它是在我省境内第一次采用科学方法对古代遗址进行的发掘，也是屈家岭文化发现和研究的良好开端；随后，考古所又派张云鹏于1956年6月到1957年2月主持了京山屈家岭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达858平方米^④，这是我省境内用科学方法所进行的首次正式大型发掘，在我省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使近代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在我省实现了零的突破。

三、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张云鹏执笔，有我省考古工作者参加，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京山屈家岭》田野考古报告，是第一本有关湖北考古学的专著，在湖北考古学专著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它的出版问世，从而确认了“屈家岭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⑤。

黄金时代

经过五十年代实现了零的突破，六十年代的前半期，考古学在湖北开始出现新的景象，尤其在田野考古方面，有了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如：武昌放鹰台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对研究江汉地区父系氏族公社早期的历史有重要意义^⑤；黄陂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城址的发掘，扩大了我们对商文化领域的认识^⑥；江陵楚纪南故城及其周围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尤以一九六五年冬至一九六六年春望山与沙冢楚墓的发掘，为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材料。

但是，湖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人所共知的曲折，曾经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文物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开始恢复，湖北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得到复甦，并且逐步取得一些新的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整个工作的拨乱反正，种种精神枷锁被彻底打破，考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重新焕发，方向明确，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形成积极从事田野调查与发掘，努力钻研学术问题的良好风气。考古学在湖北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在经历着自己的黄金时代。其主要标志：

一、党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得以恢复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指导我们工作的理论基础。在考古工作中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突出地表现为考古资料的科学性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调把考古研究建立在田野考古的基础上，湖北考古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繁荣也正好表现于此。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工程的兴工动土和农村基本建设工程的广泛展开，无数地下博物馆的大门被打开。最近十年来，配合基本建设工程在我省范围内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包括我省文博系统所主持进行的和中央科研单位及高等院校所进行的，其项目之多，地域之广，收获之大，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

二、研究方法的改进和研究成果的丰收。

八十年代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夏鼐先生指出，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每一学科同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社会科学中有许多学科和考古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考古学很有影响。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许多被考古学所采用，从而使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很大的改变和进步^⑦。近十年来，尤其是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省许多重大考古研究项目都体现了这一点。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的出土、保护和研究，大冶铜录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多学科协作攻关而取得的显著成果。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与研究，尤其是曾侯乙编钟编磬的发掘出土、保养保护、复制复原、综合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实行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结合，多学科协作攻关，从而获得更大丰收。这也是我省考古学与其它学科加强横向联系的硕果。

研究内容和目标也有较大的进步与发展，没有局限于个别新资料的整理上，而是运用这些资料从多方面深入探讨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尤其是地方历史有关的基本问题，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我省考古学专著、论文、报告、简报的编写和出版不论其数量和质量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以六五计划期间的五年为例。以省博物馆为主编写的《云

梦睡虎地秦墓》(1981年出版),荆州地区博物馆编写的《江陵雨台山楚墓》(1984年)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1985年)等考古报告已公开出版并在国内外发行,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列入国家六五计划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即将交付出版的有:省博物馆编撰的《曾侯乙墓》,省博物馆与南京大学历史系、鄂州市博物馆合作编撰的《鄂城六朝墓》。

由省考古学会与省博物馆合办的《江汉考古》从1980年创刊到六五计划期末(1985年底)已出刊十七期,共发表各类文章289篇(不计简讯,下同),其中属我省考古学者发表的考古报告及简报99篇,论文118篇。我省考古学者六五期间发表在全国性文物考古书刊上的考古报告,简报和论文也大大地超过以往,共有63篇。

三、考古专业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空前壮大。

截至六五计划期末,全省地、市一级都已有了文博专业机构和考古专业人员,大部分县、市也有人从事考古工作。全省考古专业人员数已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不足两百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三百多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一定比例。

我省考古专业队伍的发展壮大,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专业从创办(1976年)到六五计划期末(1985年)共招收本科学员五届91人,已毕业三届53人,其中分配在我省省、地(市)、县文博单位工作的有三十多人,他们当中不少同志已成为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该校还与省博物馆合办文物考古干部培训班三期、培训学员140余人。专业教师队伍也得到不断壮大和提高,他们不仅教书,还直接参加我省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并作出了显著成绩。

近十年来,队伍的专业水平也有很大提高。1979年成立的省考古学会拥有会员17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青年考古工作者,是田野发掘、整理研究、科研教学的中坚力量。一批很有才华的中青年考古学家正在脱颖而出。

四、考古发掘地域的扩大和考古研究时间范围的延伸。

近十年来,湖北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遍及全省各地、市,而文物普查中的考古发现则及于全省各县、市,这与七十年代前我省田野考古发掘多偏于江汉平原、楚郢都附近的局面有很大改观。鄂西、鄂西北人类早期活动的遗迹,鄂西以及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和商周时期的遗址,鄂东的原始文化,宜昌地区的楚墓,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有了可喜的收获。至于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近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向上可以远溯至百万年左右的猿人时代,自此而下,经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以至宋元明,内容丰富,年代上的缺环,在逐步得到填补。

五、新领域不断开拓,研究工作在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围绕长江葛州坝水电工程及三峡水库工程,由长办考古队和湖北、四川考古工作者所进行的水文考古,运用考古学的手段,为建设工程设计直接提供有益的资料,开创了考古学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先河,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表扬和建设部门的嘉许,也开拓了考古学本身发展的新领域^⑧。

从大冶铜录山矿冶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而开始的“矿冶考古”,“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⑨。

伴随着曾侯乙墓大批乐器的出土及其乐律铭文的考释而开展起来的古代乐器及音乐史的研究,把音乐考古推向了新的境地,它不仅把音乐工作者吸引到考古学领域里来,而且吸引了自然科学界的物理学、声学、地矿学、铸造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来共同研究,开创了我国音乐考古的新局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新成果,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产生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主要收获与新的探索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湖北地区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从湖北境内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在湖北境内活动的情况,探讨湖北古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面貌,已经取得了不少收获,同时,也提出了不少问题,有待我们去进行新的探索。

一、关于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

人类究竟是由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进化的?这种进化发生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争论已久而至今还缺乏圆满答案的问题。贾兰坡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哪里是人类的摇篮?是非洲、还是亚洲?亚洲南部更可信。^⑩六十年代以来,属更新世中期的兰田人和我省境内的郧县人、郧西人化石的发现,说明这个时期的人类在中国大陆上分布十分广泛,他们的发展历史当比这更为久远。长江上游金沙江畔元谋猿人的发现及其研究成果,不仅把人类历史的起点大大提前^⑪,而且它提示我们,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位于人类起源的范围之内,有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以来,在鄂西建始、巴东一带的洞穴和裂隙堆积里发现了大量灵长类动物化石,尤以“南方古猿”、“步氏巨猿”(已获得巨猿牙齿化石292枚)^⑫的科学意义较大,证明在这一带存在着早期人科的材料。虽然目前还没有找到更远古的人类遗骸及其文化遗物,但是,已经有学者从包括我省建始、巴东在内的三峡地区的地理位置及裂隙堆积情况,哺乳动物化石与自然环境,以及已获得的灵长类动物化石的情况等分析研究中,指出“三峡地区可能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⑬。

这一切向我们展示:古人类的研究在湖北有广阔的前途,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索。

二、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我国考古学、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项基本任务”^⑭。1979年4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上,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各地同志予以重视,把它列入今后的工作计划之中。我省一些考古学者,响应苏先生的这一倡议,作了有益的工作。

苏先生在把全国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六个大区的时候,指出湖北及邻近地区是其中之一大区,“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以它们的特征和变化情况及分布地域大致可分为三块:“汉水中游地区;鄂西地区;鄂东地区。”“鄂城周围的鄂东地区是尤为重要的一块。”“对其他两块的影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⑮王劲在《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一文中,据我省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把它们的文化内涵分为四大片:(一)汉水上游鄂西北一片。因受中原地区的影响,存在着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继屈家岭文化之后受龙山文化影响的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存的三个阶段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二)鄂东南一片。有含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和受长江下游青莲岗文化影响的文化遗存,以及晚于屈家岭文化的易家山文化遗存。情况比较复杂,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三)鄂西地区一片。以大溪文化为主,也还有屈家岭文化类型的文化遗存和晚于它的季家湖文化遗存。(四)江汉平原一片,集中分布着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及继屈家岭文化发展起来的石家河文化遗存^⑯。还有就这个时代某一阶段或某一种文化进行分区分类研究的。方西生把湖北境内相当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文化暂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并将它分为三个类型,分布在不同的三个地区,即鄂东北

的西花园类型；鄂西北的青龙泉类型；鄂西南的季家湖类型。^{①⑦}李龙章把这种文化称之为“石家河文化”，并把它们分为四个类型，即“1. 汉水中上游的青龙泉类型；2. 鄂西南的季家湖类型；3. 鄂东南的尧家林类型；4. 江汉平原的石家河类型。”^{①⑧}以上这些研究，无疑是有助于提高考古学的科学水平，促进湖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的。但是，作为“一项基本任务”来说，目前所作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好的开端，还有许多问题，尤其是鄂东地区原始文化及其在我国古代南北文化大交流中的影响、地位和作用的问题，研究得十分不够，急待加强。

这里还应该提到近几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对研究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意义。近三年来，我们对宜都城背溪，秭归柳林溪，宜都枝城北、金子山、孙家河、花庙堤，枝江青龙山、朝天咀，宜昌窝棚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初步认为它们是目前已知的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出土石器以打制为主；陶器比较原始，器形有钵、缸、釜、碟、盘和支座等；动物骨骼中以鱼骨最多，还有牛骨、蚌壳、螺丝壳等。城背溪出土的兽骨，不少已初步石化，经炭14检测，其年代距今七千年左右，较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早，我们暂将它称之为“城背溪文化”，它是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的时代相当，比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的时代上限可能偏早的一种新的文化^{①⑨}。它的发现，弥补了长江中游早期原始文化的缺环，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文化作出全面的分区、分类、分期的系列。

三、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

关于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历来存在相对立的两派观点——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②⑩}。有的外国学者说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也有“主中国文明是独自发展之说的，其论据是文明的发生都是在世界上的大河流域。”^{②⑪}夏鼐认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有可能有来自国外的。……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②⑫}

我国土地辽阔，大江大河比比皆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源于何地呢？我国学者历来也有不同看法。随着我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无数事实说明，长江流域以及我国其它大江大河流域也同黄河流域一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夏鼐先生早在1962年、1972年、1979年即曾多次指出过：“不能设想我们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有一个文化发源地。”^{②⑬}苏秉琦先生也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它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②⑭}湖北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再一次以生动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了这些论点的正确性。

在历史与考古学领域里，“文明”一词是对“野蛮”而言的。已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记载，已知道冶炼金属。这些就是考古学上称为“文明”的重要标志，或者叫“文明三要素”。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证明，郑州二里岗文化已具备这些条件，够得上称为文明，是属于中国文明中的商文明。二里头文化的晚期，也具备了这些条件，达到了文明的阶段^{②⑮}。

近十年来黄陂盘龙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这里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期的遗存中，有夯土城垣，深且宽的城壕，规模可观的宫殿基址，冶铸相当发达的青铜器，还有精美的玉器和

原始青瓷，人们已公认这种遗存所代表的文化，具备了文明的条件，够得上称为文明，它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又具有自己的地方特点^{②6}。至于压在它下面的文化遗存，即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遗存，发掘与研究证明，它包含有许多建筑房基，手工作坊遗址，炼炉遗迹，个别陶器上还有刻划符号^{②7}。这就是说，这里的这期文化遗存，也具备了文明的三要素，够得上称为文明。

至于盘龙城而外，湖北境内相当商代早期(二里岗期)的遗址已发现不少，见诸公开报导的有黄陂县的袁李湾^{②8}、郭元咀^{②9}，孝感县的城隍墩^{③0}、聂家寨、涨水庙，安陆县的晒书台^{③1}，随州庙台子^{③2}，江陵张家山，圻春易家山，黄冈螺丝山，大冶铜录山^{③3}等等，此外，黄石、随县、宜都……一些地方，还有相当于早商时期的遗物出土。而宜昌以上的长江沿岸，近几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知道，这里也有与中原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时代相当而又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一系列遗址^{③4}。以上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就表明：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确曾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伟大的绚丽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包含着长江流域古代居民的劳动创造在内。因此，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文明就是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土生土长而发展起来的。

四、关于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作为楚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的湖北，在旧时代，楚文化的考古研究完全是空白。就是建国之后的五十年代，也只有零星的楚墓发掘。六十年代对江陵楚郢都故址纪南城周围遗址和墓葬的发掘，才真正开始了湖北境内楚文化的考古研究。七十年代中期，全国七个省市、七所大学及中央一些科研单位的考古工作者云集江陵，对纪南城进行大规模的勘探与发掘，并获得一批重要成果，把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推向了高潮。随后在当阳赵家湖发掘了一大批楚墓并取得重要成果，楚文化考古研究从荆州扩展到了宜昌。与此同时或稍后，襄阳地区的襄阳、宜城、光化、随州，咸宁地区的鄂城，黄石市的大冶以及孝感、黄冈地区的一些地方有楚城或楚墓被发现或发掘。湖北境内楚文化考古研究呈现繁荣景象。而1980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以楚文化研究为中心议题的第二次年会在武汉召开，不仅大大推动了湖北省境内的楚文化考古研究工作，而且使这项研究从理论上获得了很大提高，从而取得了显著成绩。

1. 关于楚都考古。史载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什么地方？文王熊贲“始都郢”，郢在何处？楚昭王“去郢徙都”，都又在何地？等等。这些有关楚都的地望和年代的问题，是楚文化考古研究的重大课题。十餘年来，江陵纪南城的大规模勘探、发掘，宜城楚皇城近郊的发掘，以及我省各地一批东周城址的调查勘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今江陵之纪南城故址，至少是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时止的楚郢都所在地。这是楚都考古的重要收获。

2. 关于楚墓的分区、分类与分期。截至六五计划期末，湖北境内发掘的楚墓，据不完全统计，已达两千余座，这就为我们对楚墓和楚器建立考古学的分区、分类与分期奠定了很好的实物基础。不少同志已据此作了很好的研究。

首先是江陵，已发掘的楚墓过千座。郭德维、陈跃钧等据此进行了研究，已发表了《江陵楚墓论述》(郭德维，《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试论江陵楚墓的特点》(陈跃钧，《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等，提出了江陵楚墓分类分期的系列并论证了其特点，这是一个好的开端。雨台山楚墓的发掘，以其数量之多(达558座)，时间延续之长(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之际)，为

建立比较严密的分期系列奠定了基础。荆州博物馆的同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江陵雨台山楚墓》发掘报告的编写出版,在详尽报导材料的基础上,对这批楚墓进行了分类、分期和年代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这批楚墓的特点及其与中原东周墓,江陵秦汉墓的对比,对于今后的楚文化考古具有重要意义。

继江陵之后,宜昌地区博物馆与有关单位合作,对当阳赵家湖发掘的三百多座楚墓进行了整理研究,发掘报告有待发表,高应勤、王光镐联名发表的《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已向我们概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由于这里有一批在江陵不见或少见的早期楚墓材料,其上限可达春秋早期或西周,这就不仅在地域上扩大了我省楚墓研究的空间范围,从时间上也填补了空白,从而使我们对楚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对春秋楚文化的认识向前进了一大步,十分可贵。其它如襄阳、黄冈、孝感地区的楚墓发掘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在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开展了对全省范围内楚墓的综合研究,以期建立湖北境内楚墓分区、分类、分期的科学系列。陈振裕的《湖北楚墓综述》(详见本论文集),彭浩的《楚墓葬制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此文除湖北的材料外,还引用了邻省的材料)、郭德维的《楚墓分类问题探讨》(《考古》1983年第3期,该文谈分类依据,也涉及到了湖北以外的材料)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果。

3. 关于楚文化的渊源。这是楚文化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探索楚文化的渊源,就是要研究周初以后典型的楚文化遗存,究竟是由土著文化发展而来的,还是从外地迁移而来,或者综合了多种文化才形成的?八十年代以前,由于资料,主要是科学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局限,特别是湖北境内考古发掘资料太少,人们难以提出有根有据的科学论断,因之众说纷云,“东来说”、“西来说”、“土生土长说”,同时并存,莫衷一是。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湖北境内楚文化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虽然目前有些环节还有待深入探索,意见也未能一致,但是,一批研究成果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王劲在《楚文化渊源初探》一文中指出:“楚文化发展渊源即是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家岭文化,嗣后在楚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每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与周围地区各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也曾不断地融合和吸收了其它族别的一些文化因素^③。”俞伟超在详尽地分析了大量新的考古材料以后指出:“可以推测西周的楚文化,是在从大溪到周良玉桥等遗存的这个行列的基础上,再加入了周人的新的文化因素而发展来的。如果这样估计,楚文化就是在土著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到青铜时代之时,大大地从东、北、南、西四方汲取其它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形成的。”^④当然,这些推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可喜的是,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在不断涌现。杨权喜在发掘和研究了当阳季家湖遗址和墓葬的材料后指出:“楚始于鄂西,地理位置表明,鄂西那支大溪——屈家岭——季家湖文化,可能是楚人祖先所创造的。”其“发展过程,有些演变的趋势似可与东周楚文化相衔接。”^⑤

在探寻楚文化渊源的同时,人们对楚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楚史也进行了综合研究。由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编辑,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书的编纂完工,“记录了以考古学来研究楚文化的主要过程。”是“中国考古学中这个学科分枝开始成熟的一个标志”^⑥。

4. 关于楚文物的专题研究。近几年来,楚文物的专题研究,也得到了我省考古学者们的重视。众多的发掘品,为这种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前提;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使人们加深和

开阔了对这些文物及对楚文化本身的认识。其成果或解开了某些历史上的疑团,或为广义的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依据,也促进了考古学本身向纵深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已见的有: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楚国有铭铜器编年概述》(《古文字研究》第9辑),李家浩的《试论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考古》1973年3期),赵德馨的论楚国金属货币的一组文章(刊《江汉论坛》1983年5期1984年2期),陈振裕:《楚国的竹编织物》(《考古》1983年8期),冯光生:《古代音乐文化的瑰宝——随州擂鼓墩的古乐器》(《湖北随州擂鼓墩出土文物》,香港、中国文物展览馆出版,1984年12月)。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以文物之众多,目前的研究工作不论是广度和深度都还很不够,有待加强。例如,关于楚国竹简,已经出了多批,研究工作也在进行,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至今未能公诸于众,毕竟是美中之不足。

5. 此外,在加强楚文化研究的同时,我省考古学者还注意到了对江汉地区与楚文化紧密相关的诸文化的研究,并有一定收获。见诸于公开报刊上的论文有:舒之梅《夔越乎?夔、越乎?》(《百越史论丛》),杨权喜:《楚越关系初析》(百越史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张潮:《古越族文化初探》(《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陈振裕:《从湖北地区秦墓谈秦楚关系》(《楚文化新探》第200页),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和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楚文化及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目前还作得很不够。

五、关于秦汉文明

秦、汉(这里指西汉,下同)文明,是我国历史上高度发达了的古代文明,在我国绵长的文明史中,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秦汉文明,是我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重大课题,近几年来我省考古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绩。

1. 关于秦汉墓葬的考古学分期系列。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我省在江陵、云梦、光化、宜昌、黄冈等地发掘的秦汉墓葬已有叁百座。这是研究秦汉墓葬考古学分期系列的物质基础,由于秦代历史很短,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秦的灭亡才十五年,要在考古学分期上把秦统一前后的墓葬区别开来是比较困难的,而汉承秦制,秦和西汉墓葬的划分也存在一定困难。现在,由于云梦睡虎地,江陵凤凰山、毛家园和张家山一批秦汉墓的发掘和研究,已经确认了几座墓下葬的绝对年代:如睡虎地M₇为秦昭王51年(公元前256年)、M₁₁为秦始皇30年(前217年)^{③7},张家山M₂₄₇、M₂₄₉为吕后二年(前188年)、M₂₅₈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③8},毛家园M₁为文帝十二年(前168年)^{③9},凤凰山M₁₆₈为文帝十三年(前167年)^{④0}、M₆为文帝十六年(前164年)、M₁₀为景帝四年(前153年)^{④1}。这就为秦汉墓葬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尺,以此为主线,结合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等进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我们就可以把已发掘的三百座秦汉墓排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分期系列。这是从纵的方面讲,从横的方面讲,湖北境内战国、秦、汉墓中所反映的不同文化体系,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孰楚?孰秦?孰汉?难以区分。现在,由于这数以百计的墓葬中,既有时代准确的资料,又有丰富的器物,这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钥匙,只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必将取得很好的成绩。陈振裕:《略论湖北地区秦墓的年代分期》,陈跃钧、阎频:《江陵张家山汉墓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④2},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2. 关于秦汉简牍的研究。我省从1973年在江陵凤凰山首次发现西汉简牍以来,截至1986年春已连续在云梦大坟头、睡虎地,江陵凤凰山、毛家园、张家山八次出土了秦汉竹木简牍,数量已达三千余枚(方),约计七八万字,以睡虎地、张家山的秦律、汉律及多种佚书最

为重要,其它简牍除遣策外,还有大量涉及到西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我国历史和文化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它们的相继出土,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即时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文明以及整个秦汉史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填补了以往文献史籍及考古资料的缺环。

3. 其它专题的和综合性的研究。大量的文物资料为开展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可能,研究工作的深入又为我们认识秦汉文明提供了新的依据。如湖北出土的秦汉漆器,继承了楚国漆器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是秦汉文明中一朵艳丽的鲜花。陈振裕,《湖北出土战国秦汉漆器初探》(见《云梦出土秦汉漆器图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已从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西汉古尸研究》(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专著发行以来,蜚声海内外。作者们在对比马王堆女尸保存的外在条件的同时,指出棺液化学成分的防腐功能,对尸体的保存有重要作用,从而揭示了西汉时代我国生物化学,医学防腐等科学技术上的光辉成就,令后人引以自豪^⑫。其它如西汉农作物(《稻穗》)、纺织品、冶金术等等,也都有学者在探索之中。

六、其它各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关于秦汉以降各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也已引起了我省考古学者们的注意,并取得一定成绩。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算鄂城六朝墓的发掘与研究了,蒋赞初、熊海堂、贺中香联名发表的《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已概括地介绍了所取得的五点重要收获。

其次,武汉地区隋唐墓的发掘与研究,郧县马檀山唐濮王李泰家族墓地的发现与发掘,都有其各自的重要意义,我们期待着这些材料及其研究成果的早日问世。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初稿于东湖

七月二十日改定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王世民、陈振裕、杨权喜、舒之梅等同志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 ① 荆江分洪总指挥部文物管理处:《荆江分洪工程中的保护文物古迹工作》载《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 ② 《湖北京山县石龙过江水库工程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壹·绪言》。科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
- ④ 陈贤一、郭德维、刘彬徽:《缅怀张云鹏同志》,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 ⑤ 张云鹏:《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载《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
- ⑥ 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载《文物》1976第1期。
- ⑦ 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
- ⑧ 廖井丹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文物通讯》1984年第3期。
- ⑨ 夏鼐、殷伟璋:《湖北铜录山古铜矿》,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 ⑩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第211至21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 ⑪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同上书第4页。
- ⑫ 许春华等:《鄂西的巨猿化石及共生的动物群》,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2卷4期,1974年10月出版。
- ⑬ 黄万波:《三峡地区可能揭开人类早期活动的奥秘》,载《四川文物》1985年第2期。
- ⑭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文选集》第2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